

哥本哈根会议后如何促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

——第六届地球现况国际会议北京分会

主持人：

肖耿，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嘉宾：

姜克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和研究员

齐 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徐晋涛，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管理系主任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钧陶，爱立信公司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

开幕致词

肖耿：

大家晚上好！今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在这里召开第六届“地球现况”会议的北京分会。今天的会议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在开始的中文讨论，另外一部分是和美国、印度，还有其他几个国家通过卫星连线的英文直播。在第一阶段我们会讨论一下为本次会议而成立的气候变化中国专家小组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关于哥本哈根会议后，如何促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这次会议组织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除了哥伦比亚大学，还有爱立信公司，他们负责卫星转播的所有技术设备和技术支持，还有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是这次会议的主办方。《经济学家》杂志北京的主管 James Miles 也来到了我们会场，他在英文阶段会参加我们的讨论。

在正式进入专家讨论之前，我先邀请爱立信公司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赵钧陶给我们致辞，大家欢迎。

赵钧陶：

尊敬的肖耿教授，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晚上好！首先非常荣幸能够代表爱立信公司参与第六届“地球现况”北京会场活动，并同在座各位一起就我们所处时代亟待解决的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问题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全

球参与的讨论，同时提出来自中国的政策建议。气候变化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我们关注气候变化，就是要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环保专家和环保机构的事情，同时也是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这点上，我们认为爱立信责无旁贷。移动通信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发明之一，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人类工作、生活的习惯，也对全球 GDP 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全球通信业最具创新力的公司、移动通信市场与技术的领导者，多年来爱立信致力于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减排。爱立信开发的第三代无线通信系统，相比第二代系统单位用户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90 年代初期的约每人 90 公斤降低到目前的 25 公斤，如果我们将每个用户减少的 65 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乘以目前全球 40 亿以上移动用户的规模，其减排贡献可想而知。同时，爱立信针对行业特点，以环保设计理念，开发出更节能的设备应用，如低能耗的无限基站硬件和软件，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在社会的生命周期里节省大量能源。此外，爱立信近年来积极投身各种国际合作，如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实施的迁徙村项目，涉及撒哈拉以南地区五十万人、十一个国家。通过为非洲边远地区提供移动通信业务，如移动医疗、远程教育、小额移动支付、微型商业活动等帮助其消除贫困，推动非洲大陆最贫困的地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爱立信还与其他公司共同支持国际气候组织，共同探讨推动通信业为实现信息时代的低碳经济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日新月异的信息通信业不断提升着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能源效率，其实它的最大贡献，我们认为将其应用到其他诸多传统行业，并帮助其大幅度提高能效。如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楼宇，电子医疗等。预计到 2020 年，信息通信应用到其他行业实现的减排量，相当于信息通信业自身碳排放量的五倍，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15% 的二氧化碳减排。鉴于此，我们愿向公共管理部门提出以下建议：

1) 将信息通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纳入国家节能减排的战略；2) 将低碳的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3) 鼓励跨行业的新兴低碳服务业发展，在消除政策壁垒同时，建立低碳领域示范工程，并在税收、政府采购等方面予以扶植；4) 大力倡导低碳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等行业的发展。我们期望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能够重视信息通信行业对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发挥得重要作用，并制订相关政策，促进和发挥信息通信业在实现国家中长期减排目标中的作用。爱立信公司将继续努力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特别是移动宽带普及与应用，为人类实现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各位。

专家讨论（中文）

主持人

肖耿：

接下来就进入专家讨论阶段，请几位专家到台上就坐。

我们主题是“哥本哈根会议后如何促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这个主题是整个“地球现况”会议的一部分，其他的主题还包括贫困和经济复苏问题。在我们应邀参加“地球现况”会议之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薛澜院长，还有我本人，都希望组成一个中国的专家组，就这个问题形成一些意见，在国际上引起一些讨论。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邀请到了几位专家，其中有姜克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和研究员）、徐晋涛教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管理系主任），齐晔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和查道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家组比较有代表性。经过几次讨论，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这五点建议大家都已经拿到，就不需要念了。基本上我们的想法是，哥本哈根会议上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像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大家所预期的方案。讲的太多，做的太少。所以在我们的建议里边，贯穿一致的一个思路就是——要多做。当然在各个方面都应该多做。

接下来，让每位专家谈一谈他们自己对这五点建议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政策建议的第一条是——发达国家在全面进行低碳发展方面必须为发展中国家作出示范。这条我们听听听众的意见，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需要问专家的？

听众提问 1（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我想问一下查教授，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全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形成发展中国家中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形象。我们在提出各种政策建议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考虑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这样做会不会产生一种担心，即不利于我们国家形象的树立呢？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如果把重点放在中国的形象上，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科学本身这个事，到底是不是二氧化碳引起了气候变化，或者说气候到底是变暖还是变热，我说不清楚。但是有一条，它（气候变化）跟能源的消费相关，跟化石能源消费过快有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采取什么立场、考虑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喜不喜欢我们，

或想在国际上享有什么形象，而是在于怎样做才能更有利于在国内搞好节能减排，提高国内产品在低碳、节能、环保上的全球竞争力。至于“形象”还有“负责任”，这更多的是一种说辞。

主持人：

我们请姜克隽谈一谈第一条。

姜克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和研究员）：

全球要做大规模的减排，至于中国怎么做，发达国家怎么做，发展中国家怎么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是一种定性的表述。查教授刚才说的很对，我们可以说中国很负责任，但别人可以说你很不负责任，我们也可以说欧盟的（减排）20%、30%也很不负责任。大家如果想去做量化分析，这种努力该怎么做，关键问题再次回到这个定性描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也想减排，中国甚至想减排80%，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但问题是能不能做到？做到这个，需要支出很多的成本。所以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先承诺自己能够做到减排40%，而不只是压中国去减排，并且提一些不是很具体的要求。比如中国现在做风电，如果按照一项一项具体政策对比，在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印度这些国家当中，中国可以说是做的最好的——各种指标最低，包括占的比例。如果这样说的话，中国做得最好的，成效也是最大的。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还想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毕竟是哥本哈根提出来的。你要做减排的话，怎么做？能不能做到？刚才几分钟前（我在另一会上）还在讨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国家不同意将50%和80%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关键的考虑是，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他们的仍然是我们的一倍。我们给做模型的专家们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让他们分析一下发达国家减排90%可不可以？这样人均的量从政治角度就可以有所拉平。但是最关心的问题是，90%能不能做到？是通过大规模发展核电，还是可再生能源？

从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希望总是要有一些国家起到带头作用，但是现在按照框架公约的说法是希望发展中国家来做。并不是说中国就不做，仔细来讲，中国做了很多。

听众提问2（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学生）：

有个问题问姜克隽主任。如何理解政策建议中提到的“示范效应”？是技术

输出经济模式的学习，还是产品的转移？比如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需要的是中间技术，比如用三轮车的方式代替汽车运输，比如灌溉技术，大量的低碳排放的灌溉技术，简便易行的中间技术。在这方面很难说发达国家如何用他们现在的灌溉技术、运输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示范。

姜克隽：

我们上个礼拜公布过低碳城市。假如说我要求北京 2020 年二氧化碳达到峰值，然后往下降。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在发达国家已经被证明是好的方法。我们来一个个看一下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针对低碳做了些什么，有哪些好的做法。如，芝加哥发展自行车道，伦敦规划是 2016 年之后所有建筑都是零排放建筑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做法放到北京，放到吉林，放到工业、农业，到交通、建筑等，可以说有非常多的排序。所有的政策一项项拿来对比。如果发达国家还没有做到，那中国做一个新的尝试有一定风险。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在我们做情景里边，中国到 2050 年要比 2030 年进行大规模减排。世界各国都在公布技术路线图。日本公布了 21 种，我们的低碳情景里公布了 28 种。如果这些重大技术到 2050 年能得到普及，那么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减排。但是这 28 种重大技术，由谁来开发？中国可以承担其中一部分，如清洁煤技术。新技术研究和开发是非常花钱的，我们希望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共同来研发这些重大技术，并且保证这种技术能够让所有国家都能够低成本地使用。当然，这其中是如何操作技术转让的问题，先暂且不讲。然后全球才能做到 2050 年减排 50%。

最后一点是，有些东西各国不一样，比如你所提到的灌溉，甚至耕作。北京几个县在普遍推广免犁地技术，这些有可能是由发展中国家进行尝试然后推广。应对气候变化的模式可以是南南合作，也可以是南北合作。

齐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我来补充一下。我们说的示范，固然有单向技术方面的含义，但是更多的是在总体的减排方面。发达国家要在总体减排的努力方面为发展中国家作出示范。很多人关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在什么时候达到峰值？大家希望是不是能到 2020 年、2030 年达到峰值？这样的期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按照美国目前的方案来看，到 2020 年，它自己国内的排放量仍然不能达到峰值。它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峰值，不清楚。所以，能不能够让发达国家首先做出示范，达到峰值，然后再来要求发展中国家达到峰值。这只是说总量，还没有比较美国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四到五倍，即使是达到峰值它仍然

几倍于中国。刚才姜主任说的非常好，问题不是有没有政治的意愿，而是有没有现实的能力来做这个事情。

听众提问 3（爱立信）：

我特别想知道，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在哪些方面做示范？刚才专家说了，在技术、峰值减排上做出示范，但我还是希望这个问题能更具体一些，更有所指。我们看整个的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西方国家在技术的进步、工艺和法律框架方面是走在我们前边的。

主持人：

我也想补充一下。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很长的农业文明阶段是非常发达的。当时应该说是达到了所谓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农业社会，我们没有用蒸汽机。西方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工业化的标志就是使用蒸汽机，用蒸汽机就要用煤。在过去几百年，从来都没有人考虑过碳排放。最近五年到十年，全人类开始重视了，碳排放是个坏东西。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是，在过去两三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全世界只有 1/5 进入了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现在全球正进入一个发展阶段，即另外 80% 的人也要享受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使得碳排放至少要翻五倍。这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根据历史的情况，现代发达国家的技术、收入，还有其他各方面，都比 80% 人口居住的发展中国家要先进。那么从全人类将来的福祉来讲，他们（发达国家）应该最先找到新的技术革命。这不是说谁少排一点，谁多排一点的问题，而是说整个人类文明将来的希望是需要有突破性的技术。所谓突破性的技术就是相当于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使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那些技术。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碳排放这个东西在阻挡我们生活继续改进，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命。这个在发达国家，从收入上，技术上各方面是比较成熟的，他们应该先走一步。发展中国家现在还在为吃饱饭奋斗，让它们搞碳排放，我们觉得不可行。这是我们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做出示范的一个背景。

还有问题吗？

听众提问 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的硕士研究生）：

在 2009 年 12 月之前，大家都把哥本哈根会议称为人类拯救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但经历了整个会议之后，有些人对会议的成果称赞地热情洋溢，有些人觉得会议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我就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到底哥本哈根会议，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对于节能减排切实的政策和到底有没有为未来的发展指出

方向呢？

主持人：

徐老师能不能谈一些感受？

徐晋涛（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管理系主任）：

作为观察员，我跟着非政府组织一起参加了哥本哈根会议。在哥本哈根之前，我本人对这个会也有很高的期望。参会的头几天，总的来说气氛非常乐观。科学上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政治意愿从来没有这么大。过去几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这个排放量比较大的国家都或多或少改变了立场，变成气候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所以感觉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但是这个会的结果总的来说还是挺令人失望的，至少挺令我失望的。联合国的机制（缔约方大会机制）是期望一百多个、将近二百个国家都能在很多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从我哥本哈根大会的经历来看，我觉得离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还为时尚早。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的气氛过于乐观。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也许应该选择一个其他的机制来推动气候谈判进程。我的想法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主要利益相关国率先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就像 WTO 那样，一小部分国家先达成协议，其他国家认识提高了，感觉到加入 WTO 有利于自己发展时，再申请加入。我觉得这可能这个比都等到全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全部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更有效一些。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个国家对在排放量上，以及将来气候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在受害程度上，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各个国家在气候协议上的得失永远会有差异。要想达成一个共识，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难的。

主持人：

这就是第五条建议——为实现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构建国内政策及全球治理的新机制。

查道炯：

这一次没谈好，不是例外。在联合国谈判的历史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谈判，70 年才达成一个文件；海洋法的谈判，1958 年开始谈，谈了三个版本，1982 年才达成协议，真正进入实施阶段是 1996 年的事情。咱们讲空气里边的排放，气候变暖，海洋法里边涉及到海里的采矿、捕鱼都是很现实的。所以第一，不成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要气馁；第二，对于中国来说，这次的会议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就是教育效应，历史上没有那么一次全民参与。我们的 NGO 去了，大型

的房地产商去了，教授去了，政府官员去了，而以前没有多少直接接触国际会议的机会。

最后讲两点，第一，在中国大众教育里边，关于国际谈判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可能讲的不是太清楚，这次谈判带去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也就是京都议定书里面附件一的国家，目标是要去京都化。而我们是要实行双轨制，不想去京都化。中国在京都议定书上白捞好处的。大众教育里没有讲这个东西，实实在在就是钱的问题。第二，有人把这个事情指责中国，这与中美类似。在奥巴马政权交接之前，一些专家就说了 G2 这个概念。像徐老师讲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联合国的机制不行。怎么让它行呢？中美先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和 APEC 达成协议（因为 APEC 占 65% 的全球贸易量），然后让欧盟加入。当然，从外交决策上来说，有人认为，美国人是新的单边主义，把中国人拉上贼船我们不干。我要补充的，这次没成功是个很好的教育机会。之前有同学讲形象问题，形象好，得有钱。除了科学之外，更多的是钱的问题。

齐晔：

这个穿衣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时候花钱也不一定买到好衣服，比如皇帝的新装。我接着查教授再稍微解释一下。《京都议定书》是 1997 年形成的，里边规定了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在减排上的责任，即从 1990 年到 2012 年减排 5.2%。当然了，我们知道像美国等其他一些国家就一直没有加入。事实上“去京都化”，即抛开京都议定书的努力，实际上很早就已经展开了，只不过是到了哥本哈根这次会议上，更加尖锐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哥本哈根会议）希望能够在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之上继续。因为国际谈判本身就是非常艰苦的过程，如果你另起炉灶，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但是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不能说中国白捞好处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白捞好处，是因为中国没有包括在附件一所列的国家当中，所以没有绝对的减排量指标的约束。相反，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中国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的“减排信用”来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利益。“利益”是见仁见智的，所谓的“去京都化”，就希望把中国包括到里边去。这里确实是有利益之争。

姜克隽：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意义，我想简单说几句。大家对哥本哈根会议失望，代表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如果回到“到 2020 年实现全球 2° 升温”这个目标上来的话，我对它的进程还是满意的。因为它并没有对全球减排这一大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对比在哥本哈根最后一天我们所写的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文字，差别有

两点：第一，哥本哈根没有最后达成全部一致赞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第二，一些具体的文字描述去掉了，如关于 MRV、技术转让等，但是从核心内容来讲，实际上是和原来的期望值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整个的途径没有因为哥本哈根会议而发生重大变化。刚才查老师说的很好，我们从进程里边学到了很多，包括我们是不是再继续这种 UN 这种进程，现在都在讨论，而且声音更加的广泛，这实际上是对 UN 进程非常好的历练。但是我有一个期望值，我想今天在座的都是关心气候变化或者低碳发展的，我们要小心的保护这种进程。我们不要因为发生某些事情就对它进行否定，而是要告诉它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听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培训班）：

前几天看电视，中国科学院有些研究古气候、古地质的院士说，地球历史上曾经有过二氧化碳高于现在两百倍的时候，但是气温并没有升高。照他的说法，气候减排谈判是个巨大的政治上的、商业上的阴谋，几位教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姜克隽：

我希望提醒这些院士们学术要有严谨性。我专门请过你说的那个院士到我们那做过讲座，按照 IPCC 的进程，我们要求发表他的论文，而不是只是提几个问题。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提的好几个问题是我们研究的专业领域，不是他的研究领域。像我是模型研究的，我很难跨到查老师做的国际政治领域。他现在提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古气候，他是做岩石的，冰心里面采取的气泡和在岩石里面采取的气泡，包括几万年以后，二氧化碳是不是能够渗透出来，因为冰心里面是有水膜，但是在岩石里面取得的二氧化碳气泡，还需要提供更多的依据。第二点，你最后那句话，是不是气候变化的阴谋，最近 IPCC 发生这种问题了，我也想简单解释一下。第一，IPCC 本身不做研究，它的职能是评审全世界所有的研究成果，一个工作组的报告大概就要一千页，每个工作组要回顾几千个研究成果。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出现，不会根本改变 IPCC 的结果。我也多次提到，在地球历史上出现过温度明显上升的状况，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证明在上升十几度的情况下，对当时物种的重大影响，是否出现过大规模的物种消亡。因为我们现在不想让人类消亡。

查道炯：

阴谋和阳谋在于你自己心里干净不干净。之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是阴谋，是因为对本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心里没有底。姜主任做的是测算。中国目前没有一套监

测我们二氧化碳排放的体系。环保部今年才发文件，在 31 个省会城市搞试点监测。别人说你是排放量第二还是排放量第一，这些都是估算出来的。外国人在估算，我们的专家也在估算。如果真要减排，就得有一个监测体系，就是说要从科学走到行动。不管有没有协议，如果要有行动的话，国内的和国际的是相关的，国内没有监测体系就做不好。刚才说心里干净不干净，不干净就是这样。美国连自己国内的协议都搞不成来说中国的事；中国连具体监测的设备都没有，然后说你检测 20%。扯皮扯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扯在碳关税。联合国的谈判三步曲，大家只讲了两步，第三步就看心干净不干净，就看你长没长眼睛。头两步是 **pledge and verify**，同意一个指标，相互核查，如果没达标怎么办？没达标这项目就得有个惩罚机制，去京都不是个简单的话，京都是个奖励机制，现在这个联合国谈判是个惩罚机制，没达标就得补偿，怎么补偿？最后还是钱的事，是个碳金融的事。碳金融是个挺复杂的事。这不是阴谋，但做起来都不容易。刚才说了，谁不想衣服穿好点儿？得有钱，还得有眼光挑到好的服装设计师，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作为咱们国家节能减排外在的动力，这条是牢不可破的。不要因为有人怀疑，有人说阴谋，或者有人风凉话就不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还是应该做好，包括开始建立监测体系。

齐晔：

我简单补充两句，还回到科学问题上来。气候变化是个大擂台，科学是个大擂台，想打擂，就把你的文章发表在很受尊重的科学领域的杂志上面去，实际上不用争论，科学问题是科学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有些人喜欢把科学问题政治化，那你也拦不住。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讲的是规则。

主持人：

所谓规范的研究，还有公开的辩论，科学的方法非常重要。另外就是说阴谋论和阳谋论，特别是在国际关系里面，你如果把一个对手看作是一个敌人的话，他最后就变成敌人了。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些超脱的精神。你看问题不能只看一个家庭、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你要看全球；不光看今天，还要看明天、后天，子孙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有国际和历史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都考虑一百年以后的事情，可能不会打架。一百年之后谁该做什么，大家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如果说明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的就可能影响你的生活工作，那肯定要打破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所有的建议都是比较建设性的，应该做的事我们应该去做，先不要去管对谁有好处谁有坏处，先不要去争论利益，特别是短期的利益，先看在全人类层次上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有

什么挑战我们需要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其中提到有一条，即第四条，关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包括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些都是需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天天讨论谁的减排目标是多少，谁应该负多少责任，吵来吵去永远吵不出结果。

还有什么问题？

听众（首都经贸大学的学生）：

如果中国最后承诺一个减排数量，中国政府如何保证减排结果能接受国际的公开透明的监督？

姜克隽：

现在有几个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不担心实现 45% 的目标，现在就是说，我们做的第一次国家通讯已经提交了，现在正在做第二次国家通讯。从技术角度来讲应该足够详细了。

徐晋涛：

林业方面也许还没谈到，我也想谈一谈。我个人觉得，中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提出来的措施，总体来说在态度上比过去迈进了一大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认识，进步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我认为这些措施还有一些遗憾的地方。中国承诺在温室气体强度方面进行减排，同时又有几个其他的措施，包括植树造林，把这几个东西当成平行的，而不是结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减排仅仅是直接的减，40%、45%，其他的活动似乎都是义务劳动。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本来减排就是社会成本很高的行动，应该把自己有比较优势的所有措施都结合在一起，变成捆绑的承诺，而不是把它们分开。中国承诺在 2020 年之前营造 4000 万公顷，这是个非常大的社会努力，也会吸收非常多的碳，但是没有把这个当成自己减排承诺捆绑的政策，而是作为附加的义务劳动提出来。国际上有人批评中国的力度不够，是说 40%、45% 这个力度不够，但是没有看到中国在其他方面还承诺了很多东西没算到里边。我觉得，咱们在研究的时候也应该更仔细一些，把这些考虑进去。你看巴西的承诺，就把减少森林退化、减少的排放算进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林业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已经找到了减少森林退化的途径。怎么利用现在这个机遇，把中国这些成绩也算到减排的承诺里去，这个就会对国家的形象有非常大的改进。我实际上做过一个粗的测算，我不是根据四千万公顷，而是根据过去林业系统在自己内部推算哪些可以作为合格的碳汇造林项目，现在已经每年抵消工业排放 8%—10% 的排放量，这还不是最

激进的估计，只是个中等的估计。而且碳汇的增长速度很快，如果把所有的潜力挖掘出来，只取其中的一半，中国到了 2020 年总排放量实际上就可以不增加了。当然这是比较粗略的估算，并没有被官方认可。所以我觉得，中国社会实际上有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在承诺提出自己的措施里面，有的时候太过宽厚，减排的指标是硬的指标，其他许多实际上是也是要付出非常大的社会成本的，但是以义务劳动的形式提出来，这个应该有个思考。

查道炯：

这里面有个利益的问题。2006 年在澳大利亚开 APEC 会议的时候，胡主席在一个关于气候减排的讲话中提到，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打算增加森林覆盖率。胡主席的这个讲话被外国媒体嘲笑，说中国人不认真。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来谈这件事要有自己的信心，我们做这件事的基础是怎样才对我们有利。当然，外国人批评你，也有他的原因。我们国家批 CDM，第一类项目最早是水电，第二类就是森林碳汇，就是在内蒙种树，拿的是意大利政府的资助，这个树长起来根据测算，吸收了二氧化碳，这个吸收的信用算到意大利的头上。你把这个事情反过来想，为什么外国人笑话你不认真，是因为他把胡主席的讲话理解成中国无非是再向他们要钱在中国种树。其实，即便没有 CDM，即便没有全球的谈判，植树造林对国家有好处，这是好事。所以我们要找到信心在哪里，一步一步走稳，稳不稳还是看你自己的脚。

齐晔：

我补充两句。这个问题背后有这么两个假设，一个假设就是中国似乎应该接受国际的监督。第二个假设，似乎是说如果没有国际的监督，中国的承诺可能是不可信的。就说第一个吧，应该不应该接受国际的监督？2007 年 12 月份在巴厘岛上开会的时候，提出来两类区别对待，一类就是附件一的国家，减排的承诺要接受所谓的 MRV 的监督，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接受监督是有条件的，这部分是属于由附件一国家所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这部分需要接受监督。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区别开来，我们自己主动的提出来的这些方面的减排的承诺，就是按照国际的规则讲，是没有义务受监督的，这是一层意思。另外的一个，如果没有监督，我们是不是这个就不可信呢？因为大家对我们的数字，过去似乎有了污点，但是应该说，中国政府在最近的这些年，作出了非常认真的努力。比如说在 2007 年 11 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公布了关于节能和减排两个领域当中分别的数据统计办法、监测办法和考核办法。这些年，我们把全国及各省减排的成果对外公布，这种努力很认真，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很少有这么大的国家短期内取得如此巨大的

成就。

主持人：

中国从文化和制度来看和西方不太一样，西方什么东西都要立法，西方总统最多是八年，如果不立法是不算数的，一定要有一个机制去检查。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不太一样，领导人说了就算，领导人经过了非常认真的过程，达到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从上到下要贯彻政策的时候，比西方提出来的法律还更有效。当然了，因为文化的不同，相互之间有很多误会，当中国领导人非常认真的提出一个目标的时候，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就觉得，你也没有立法，我也没法去查你，你就算什么东西；但是在中国来看，这是领导人讲的话都算数的，这方面有很多的误解，因为政府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中国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我觉得应该是肯定的，这几年的变化，特别是过去一两年的变化非常大。

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看看最后的问题，一起问了吧。

听众（中国人民大学）：

这个问题主要关注到国际清洁技术的开发利用和转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一直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有丹麦和中国的风能转让。我想问一下齐晔老师，在国际社会当中，对国际化的机制和制度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意见吗？

听众（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我想问一下关于发达国家在减排上双重标准的问题。刚才也说到哥本哈根虽然没有达成实际性的东西，但是我注意到，它也作出了一些规定，比如说规定要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都要在减排问题受到三可问题的约束，但是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自己在减排问题仅仅是国际法的约束，这种实行双重标准。专家怎么看？

听众（清华大学 MBA 研究生）：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中国通过哥本哈根会议，它体现了大国的话语权，那么从国际关系角度，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次谈判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态度，是否更务实或者发挥了大国作用？第二个，通过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政府做的承诺，如何体现更好的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然后更好的推动中国的国家利益？

听众（卫生部）：

我想就第五个建议是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机制提一个问题。我想在座的教授们，你们的建议当中，这个新机制是什么具体的含义？包括不包括建立一个法律性的文件？从卫生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发生过非典，在这个基础上，国际社会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了会员国要及时通报国际关注的卫生问题，如果发生问题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核查等等。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是不是中国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谢谢。

听众（《绿叶》杂志）：

听刚才各位专家介绍，现在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一种商业的手段，比如说清洁发展机制等。我的问题是，气候变化是关系到人类发展阶段和人性的问题，这种商业的手段是不是解决气候变化的最根本的一种手段？还是一种权宜？谢谢。

听众：

各位老师好，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碳排放减排目标，会不会通过石油涨价来减少石油的排放，因为查老师在几年前我就听到过，您说的石油高度涨价，我们家恰恰是做运输的，对石油是特别敏感的。第二个，会不会一些大国，比如像中国，像美国，利用碳排放打政治牌？我就是想问，怎么样防止大国利用碳排放打政治牌绑架全人类？

齐晔：

没有笼统的清洁技术，有好多的类型，你可以看一下麦肯锡的报告。

我想回应一下绿叶杂志的问题，实际上确实通过一些经济市场的手段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也相信地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企业、市场这些经济手段，但是我们整个企业它所运行的外部环境，应该是有大的变化，否则的话，仅仅靠着企业，仅仅靠着市场，仅仅靠着亚当斯密说的人类追求私利来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公共问题那是不可能的，要靠外部环境。

查道炯：

我用三句话回答，第一个是中国是不是强硬和务实？我在达沃斯碰到李肇星，他让我讲讲哥本哈根我们哪一点做错了？我告诉他，我说中国太老实了，干脆宣布到 2080 年减排 120%。第二个回答，是不是通过石油涨价？这个里头我们要来综合的看消费化石能源它所耗费的成本，不能一味的追求便宜，这是不可持续的。最后关于国际新机制，第一应该是有法律的，第二是机制的设计。三可本

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设计三可。

姜克隽：

我有几句话，第一关于技术转让，国际技术进入中国，现在来看总体状况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进展的非常缓慢。我们要把它分割开来，技术转让进入中国还是可以的。

第二关于空间的问题。中国肯定要担当起我们的责任，中国现在经济实力太大。石油涨价肯定是要涨价，但是目的不是为了增加你的负担，是为调整结构，总体税负，包括碳税重新分布。

徐晋涛：

刚才那位先生讲国际新机制问题。我觉得所有国家坐在一起谈气候问题，这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为子孙后代一二百年以后人类的生存谈，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应该维护爱护这个机制。但是还有很多人认为气候问题是一个刻不容缓需要马上采取行动的问题，如果等到联合国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再采取行动，我个人认为肯定会错失很多时机。如果联合国达成协议困难，应该由主要的利益相关国率先达成协议，也许是更有效。这是我对机制的理解。

主持人：

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我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需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从全球化和长远的角度，我们面临气候变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人类历史这么长时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也是个小问题，我觉得在人类长远历史上是个小问题。我还是充满信心，我所有的建议都是强调要做。谢谢大家。